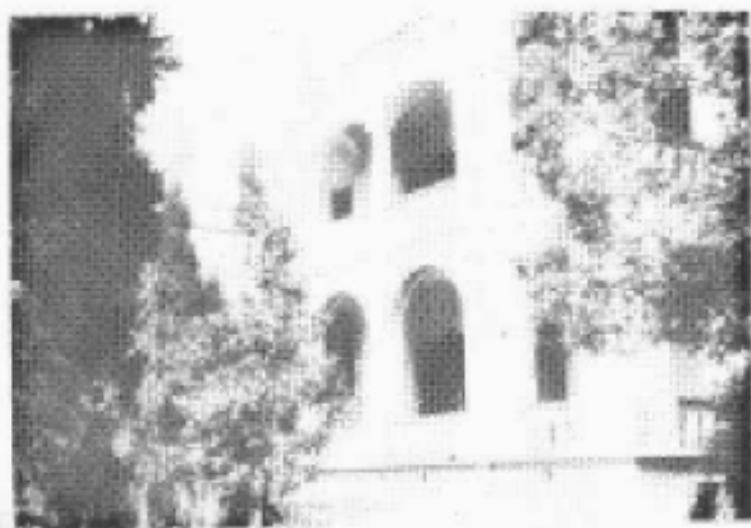




yt182/30

汉口自治街47号，抗战前为旧府街，汉
口市政府设在此，现为武汉市江汉区社会
福利院。

敌伪时期，武汉特别市
政府设在南京路汉口商
业
银行内，现为武汉市图书
馆。



胜利后，汉口市政府设
在一元路，原德国领事馆
旧址。



解放前，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旧址，现为武汉市卫生局

位于汉口六渡桥的百货商店，解放前为远东饭店，日伪时期汪精卫的行营、行辕均设于此。



一九八七年第三辑（总第29辑）

沧 拾	桑 零	人	物
我所知道的湖北反省院	王世杰——蒋介石的智囊	日伪武汉市长张仁黻	追怀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老师
解放前夕的汉口仁德医院	蒋介石与武大抗日请愿团	王铭章师长哀荣录	关于孔庚的二三事
	李书城与孔庚	湖北“怪杰”石瑛在南京	李书城与孔庚
	万民含泪吊忠魂		
		程 华	徐明庭
		许 昭	李 阳
		杨 清	吴 斌
		吴 斌	吴 忠
		万 亦	万 亦
刘仲衡	冯彩丞	81	74
96	86	51	45
		37	29
		8	1



武汉文史资料 季刊

社会百态	新叙	闻旧	城史	建话	谈往录
旧时玩蟋蟀的见闻 花 会 回忆旧社会的相命骗术 解放前的武汉赌场黑幕	记武汉新闻摄影通讯社	民营江汉广播电台始末记	汉口汉阳的古桥(小资料)	江汉桥建桥纪事	国民党特务打入邮政的内幕 话说邮局「铁饭碗」 粤汉铁路修建始末 长江航政十五年
刘文保 袁 元 郭瑞廷 胡是依	舒兴文	郑光祖		唐 宸 澄	梁 绍 栋 尤 智 何海元 陈叔同
177 172 166 160	156	151	150	146	131 118 111 104

王世杰——蒋介石的智囊

万亦吾



自解放以来我写了不少材料，其中有许多地方涉及或提到王世杰。但一直未曾把王世杰作为专题写出来。现在写这篇东西，主要是谈我与王过从期内所听到见到的一些事实，从一定角度看，还可能有一定史料价值。

首长武大 蒋介石垂青

王世杰，别号雪艇，1892年生于湖北省崇阳县。壮年游学英法，习政治，专攻宪法，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到北京大学教宪法。时值五四运动，新旧思想斗争剧烈，王邀其同道创办《现代评论》，与鲁迅先生常为撰文的《语丝》唱对台戏。当时称为“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

1929年，王世杰奉当时大学院长蔡元培之命返回武昌，担任武汉大学第一任校长（此前刘树杞代校长），并邀杨端六、周览（颢生）、任凯南等为教授台柱，把武汉大学办成为一个“著名大学”。蒋介石在“剿共”期间，曾找王世杰谈论国内政治经济问题、国际法外交问题，王以其顽固头脑，披上“学者”外衣，又有西洋资产阶级“理论”为之装璜，于是大得蒋介石欢心。

“九·一八”事变后，举国激愤，尤其平津京沪各大学学生，要求全国统一，停止内战，共赴国难。抗日之声，响彻云霄。平津学生卧轨截车，南下请愿，南京城中集满全国各地请愿学生，蒋介石穷于应付，认为当时教育部长蒋梦麟“任职无方”，乃示意行政院长汪精卫把蒋免职，派王世杰接替。

蒋介石办事独裁武断，喜怒为用，对人从印象出发。在全国各地大学生集中南京后，多数学生代表均主张对国民政府示威游行，独武汉大学学生代表请愿，不搞示威游行。等到蒋介石接见学生群众时，各校学生代表发言，情词激烈，提出要求。独武汉大学代表在蒋介石接见时，只言请战这一件事，加上蒋介石在武汉时邀集王世杰讲学那一段经过，就造成了蒋调王任教育部长的充分条件。

推行“党化”教育 热衷欧美政坛

王自1933至1937当教育部长五年，他体察蒋介石意旨，在全国大中学推行党化教育。“党义”成为必修课，设专任教师，用奖学金办法拉拢收买学生作国民党的忠实工具。王利用段锡朋（北大出身，江西A、B团头子）、雷震（河南留日学生反共能手）分别为他的政务次长和常务次长，推行党化教育不遗余力。由此不但王本人加深了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段雷二人也官运亨通、一帆风顺。段后来升了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的主任，雷一直跟王世杰到国民参政会当了副秘书长。

王世杰事后自称他在五年教育部长任内，最为出色得意的一件事是恢复留学生制度。王本人是个留学生，对于留学一事有甚深的迷恋。他的中心思想是：要“救国”必须有近代科学知识，一切新的科学知识均在西欧（英法德为代表）、北美（即美国）。因此，必须通过派遣留学生，把欧美科学知识学到手，拿回中国，以高官厚禄把留学生安置在各行各业的统治宝座上，使他们发挥

所学所长，蔚为国用。他利用庚子赔款（如中英庚款、中美庚款），清华大学，各省、特别市，最后直到教育部本身，都设有专款专管，大派起留学生来。一时留美留英留法留比留德的学生激增，不但官费留学激增，私费留学由于他的“提倡”，可以买到便宜外汇，也如雨后春笋。1935年至1937年间，我在伦敦一地就遇到中国官费私费留学生五百多人，真可谓“懿欤盛哉”！

蒋介石“智囊” 历任要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在他的军事委员会内设立了一个“参事室”，这是他学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智囊团”而设置的。派原浙江省主席的朱家骅为主任。下面派了几个参事、专员，人数不多（6个参事、3个专员），却是“极一时之选”的。但朱家骅为人浮躁，辜负了蒋介石的“倚畀方殷”，他的奏对经常不能称旨。这样又勾起蒋介石怀念王世杰的心绪。这时王世杰已不任教育部长，遂调王继朱家骅为参事室主任，将朱调往国民党中央党部。当时许多人认为王受到排挤，那是他们不了解军委会参事室的重要性。

王世杰从1937到1945年间，虽然曾经兼了许多国民党党政机关的“长”字号的官，如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到重庆后又任国民党宣传部长，1942年又继张群任中央设计局的秘书长，1945年8月辞去宣传部长而当上外交部长。但他的这个“参事室主任”的“名小实大”的官，却一直蝉联下来，直到1946年军委会撤消。

王世杰以参事室主任而担任许多国民党重要官职，说明他在蒋介石面前深得信任。他为什么能取得这一信任呢？据我个人与王世杰七年过从关系，耳闻目睹，有以下几点可以谈谈：

（一）关于国民党外交路线 王世杰醉心英美，他从来认为中国非有英美“援助”，决不能复兴富强。抗日战起，他的亲英

崇美思想更加浓厚。在蒋介石面前替美帝吹嘘者大有人在(如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胡适等等),不止王世杰一人。但吹捧英国如何可以援华抗日者,王实在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是中英庚款董事、中英文化协会会长、中国留英国学会会长和1943年访英团团团长。平素与英国公私方面往来极多。终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把他的“胜利希望”建筑在“美国援助”的“基础”上,但同时也一直拉拢英国,得到了几笔英镑贷款及军火物资的接济(重庆号军舰是英国所“赠”)。开放滇缅路和中印空运,都是“中英友好”的“标志”。为了拉拢英国,1943年王世杰还建议把多年以来的驻英大使郭泰祺,调回重庆接替王宠惠的外交部长,当然得到蒋的裁可。可是郭泰祺不为王争气,没有侍候好蒋介石,干了不到半年就免了职,使王在蒋面前长时间不敢再“荐贤”了。

王世杰的外交路线重点摆在英美两国,但他对于苏联非常畏惧。这就与他的反共立场联系在一起。外交问题引出内政问题。长期进行的国共和谈,在国民党方面虽然前后有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参加,但“主其事者”始终是王世杰。所有蒋介石给共产党写的信函、电文、复函以及有关中央的政府文告、声明,多出于王世杰和陈布雷之手。

王世杰建议蒋介石以外蒙古与东北问题,即承认外蒙独立并许给苏联以重占旅大及合办中东、南满铁路(后来的中长铁路)之权的解决,断绝苏联支援共产党之手。当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宋子文感到对苏外交棘手之时,王世杰便在蒋介石面前夸下海口,说他可以收拾中苏外交,打开僵局。这就是1945年8月1日他当了外交部长,并亲自赴苏签订《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的底细。

(二)关于经济财政问题 参事室除了外交问题对蒋不时上条陈外,对于经济建设、财经政策、赋税货币制度也常常提出“计划”。在国民党政府内经济权要是翁文灏,财政寡头是孔祥

熙，但蒋介石在裁决财经问题时，往往要听一听他的“智囊团”王世杰一帮人的“高见”。这些“高见”当然不是一概被采纳，但有时也能把孔、翁那些人所奏的“专案”推翻。举一个例子来说。1944年冬，孔祥熙为了进一步搜刮四川老百姓，竟向蒋介石提出征收人头税的办法来，美其名曰“国民义务劳动税”。蒋把这个案子送到参事室审议，引起了王世杰的强烈反对，他怕四川老百姓造反。他的“签呈”生了效，这个“国民义务劳动税”专案计划就被打消了。

（三）关于工业化问题 王世杰有一套想法，想在抗日时期，利用英美战时贷款的一部分在“大后方”搞工业化，用购进英美机器在川康腹地设厂的办法把轻重工业办起来。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无意于在这些地方搞工业化，而利用战时举债、租借法案，骗取大批外国贷款，通过“四行”侵吞，饱入私囊。

（四）关于战后复员与缩小东北省区问题 王世杰在中央设计局当秘书长时，起草两份草案，一份战后复员计划草案；一份东北省区缩小计划草案。他的这两份草案主意主要打在反共灭共上；其次是打在消灭东北“土势力”（张学良的“余孽”）上。反共灭共当然是办不到的，但原任东三省“流亡主席”的万福麟（辽宁）、邹作华（吉林）、马占山（黑龙江），却以“东九省”的成立而“被请”下台了。

八年以来，王世杰以其老辣的反动智谋，利用“签呈”、“汇报”和“面陈”取得了蒋介石的青睐，成为四大家族系统外的一个“红人”。

依靠学阀势力 拉拢官僚集团

王世杰的政治本钱来自他的“学阀”势力。他以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留英学生为培植私人势力的渊源地，拉拢了大批同僚同事、学者教授、前后同学、及门弟子和私塾学生。这些人在他作

官阶段构成了他的大小干部集团。

他自取得蒋介石信任后，便当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后改为执行委员，升为常务委员，作了宣传部长。这一切还只能算是作“党官”，尚不能说明他的政治路线。

在国民党政治集团中他被划入政学系。对于他“是”政学系这一分类，他时而摇头，时而皱眉，时而厥嘴，大多时间是默不作声。有一次我在他面前问了这事。他说张岳军（张群）与他不过是作朋友。这充分说明他知道张群是政学系而且是头子。但他只是与他作朋友，近于政学系而非政学系。王世杰是“中国政治学会会长”，1942年政治学会开第三届年会时，他却请张群到会讲演，以明彼此依赖之殷。

对于国民党其他派系，王世杰最看不起孔祥熙，怕宋子文，疏远C. C.，接近复兴。他的门生手下有大批复兴分子。

王世杰与“出版界”王云五的关系密切。他的《比较宪法讲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并编入《大学丛书》。王云五是商务的老板，他聘王为《大学丛书》委员。王云五当了参政员，他们两人愈益接近。1943年王世杰访英时，把社会贤达的王云五也拉进去作访英团团员。王常在蒋介石面前夸说王云五如何有学问，如何精细能干。这又为后来蒋介石重用王云五（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伏下张本。

我与王世杰的关系

王世杰平生不吸烟不饮酒不跳舞不要钱，一副比英国绅士还要绅士气的派头。这一点吸引了我。我也不吸烟不饮酒不跳舞不要钱。因此，在国民党反动派中独看上了他，安心而忠心为他当了五年助手。临到东北光复，我要回东北老家辞官不作，他还殷勤挽留我。在我执意不留时，他又为我安排了中长铁路的要职（中方理事）。他把我拉进设计局。在他辞掉设计局后又把我带

到他的参事室。两事看来是他对我的特殊眷顾，有知遇之恩。

在日常接触中，我体会得到，王世杰对蒋介石的确忠心耿耿，为巩固蒋家天下，忙的不可开交。他的太太（肖友梅的妹妹）对我说，每次他通知回家吃饭，她都要在约定时间之后等上两三个钟头，才见他匆匆回来，吃后不休息又坐车出去了。真有点食不甘味，席不暇暖。在蒋的面前，他也能不拘形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了，规定国民党大小官吏都要买一本念念，完了还要写出“读后感”。王世杰要我替他写篇读后感，我拿起笔来写了几张纸，以为他会采择抄呈。谁知他全然勾掉，自己写了“君子不念旧恶”六个字当作他的读后感。我那时真佩服他的大胆而又以简驭繁的精神。

王世杰还酷好古玩，尤其古画。他用他的“官俸节余”，搜罗了大批古玩古画。特别注意清初四王的东西，大概是作为“家珍”吧！他的交好如马衡、王征，被认为是品鉴专家，他的东西全经他们过目。他常自豪地说这是他对国家保存文物的一点功绩，要在抗日完了，他作六十大庆时，开一个展览会，把这些东西捐献国家。他是否这样做了，我不得而知。

1948年我同王最后诀别时，曾转劝王世杰毅然下野，与蒋介石斩断瓜藤，或回长武大，或放洋任无任所大使，求得人民和共产党的谅解，尚有存身国内埋骨故土之余地。他那时当然不会听从我的话。但今天看来，君子不以人废言，果能重嚼旧橄榄，补亡羊之牢，时犹未晚。

（1965年国庆节于北京）

作者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

追怀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老师

吴忠亚

- | | |
|-----------------|--------------------|
| 一 半治学半从政的一生 | 二 继刘 李筹备之后首任武汉大学校长 |
| 三 顶邪风战恶浪把建校坚持到底 | 四 武大新校舍第一掘工程竣工 |
| 五 武大作资本蒋介石垂青 | 六 教育部长并不顺心 |
| 七 抗战以后历任要职 | 八 老死台湾不忘武大 |

先师王世杰，是二十年代初，对我国现代法学建设有过卓越贡献和深远影响的一代法学大师。当时他以其博学，雄霸“北大”法学讲坛。然而比较起来，先生的业绩，尚应以创建国立武汉大学为后来居上，并为其平生之冠。当1929年，先生就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时，这所大学还只空有一块新招牌，全部校景还只是未完成的蓝图。校址珞珈山（原名罗家山，武大建校后由闻一多建议改为今名），也还是一座荒山。先生就任后，在短短三年内，使校声得以鹊起，原来规划的建校蓝图得以成为现实。这不仅在旧中国高等教育建设史上，是光辉的一页；对新中国高等教育建设事业，也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笔者作为武大的第二届毕业生，在学校度过四年（1929～1933），因得耳闻目睹当年母校的一些创建情况，并对当年校长王先生的建校思想和创业精神，有切身了解和体会。兹因《武汉文史资料》编者约稿，情不可却。盖以王先生辞世多年，及门弟子纪言述事，义不容辞，勉成此篇，供参考而寄哀思。

一 半治学半从政的一生

先生字雪艇，湖北崇阳人，生于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

幼时初入乡间私塾，接受传统方式启蒙教育和国学教育，继入武昌优级师范学校，接受现代科学和外国语文教育。这两方面的初期教育，是他后来在学术上取得卓越成就的有力基础。当时值清末国势衰败，外侮日亟，瓜分之祸，已迫眉睫。先生少年时代的纯朴心灵，也不能不感到了这种时代的沉重压力。他矢志讲求实学，为实业救国之计。师范毕业后，乃复远赴天津，考入北洋大学矿冶科，专攻采矿冶金之术，期以此富国强兵，酬其报国夙愿。入学未久，辛亥革命爆发，他闻讯奋起，毅然辍学南返，投身于革命行列，任武昌军政府秘书。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稽勋局论功行赏，先生不愿为官，得由民国政府资送赴英留学。这时他由于经过一番革命实践，深感民主建国，较之实业救国，更为急切和根本，因而他的学习志趣，也就由醉心自然科学，转变为醉心社会科学。故在抵英后，不再继续学习矿冶，而是翻然变计，考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从头学习政法。这自然大大增加了他当时的学习难度。但为了借鉴欧美各国的民主法制，使有助于新生民国的民主建设，决心迎难而上，终于在四年之后，取得了英伦大学政治经济学士学位。随又转入法国巴黎大学法学研究院继续深造，两年后取得了法学研究上的最高成就，成为法国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

在留英、法先后六年的漫长时间里，先生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之中。不仅博览群书，遍及欧洲古典政法名著和当代政法名家学说，还利用各种机会和余暇，对英、法等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及其运用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并比较研究其长短得失。凡所论述，皆博采各家学说，自成一家，尤贵在理论与实际并重。以是早在学成归国之前，先生已以其博学，蜚声于欧美留学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耳其名，预约归国后任教“北大”，先生也欣然应聘。以讲学为其报国之始，自是置身于“北大”法学讲坛者凡六年。并前著有《比较宪法》，为海内法学界

。所宗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先生应邀南下，受任为法制局长。越一年，改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更以其建校显绩，大著声于全国教育界。1933年，被调赴南京，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1938年，转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又复先后兼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为加强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及战时国际宣传，贡献了力量。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外交部长。1949年退隐台湾。1984年病逝台北，终年92岁。

二 继刘、李筹备之后首任武汉大学校长

如前所述，1929年，王先生受任为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时，这所新大学还是只能在武昌东厂口前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旧址的大门口，挂起了一块空牌。为人们所憧憬的壮严宏伟的新校舍，尚在设计之中。珞珈山新校址，也还是一座满目荒凉的荒山。前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建立于民国初年，是这里最早出现的第一所现代高等学府，也是我们母校的第一代前身。她伴随民国诞生而诞生，经历了民国以来的风风雨雨。仅只校名，就被更换过四次。她的古旧校舍，还部分是前清时代的遗物，从那时起，一直被修修补补地沿用下来。当时新上任的王校长，也就是只能在这座古老破旧的校舍里，收拾好一间陈年老屋，作为他的办公室，开始干起了他的新大学创建工作。实在说来，这份艰难缔造的工作，也并不是由王世杰先生从头干起的。

1927年11月，新桂系的军人胡宗铎、陶钧盘踞武汉，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摧毁了国共合作的中山大学，杀了校长李汉俊。其时《现代评论》派（编纂人有胡适、陈独秀、李四光、丁文江、丁燮林、唐有壬、彭学沛、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杨端六、任凯南、陈源、皮宗石等）诸人，正谋向南方发展。他们多是北大教授，与蔡元培有着良好的关系。当中山大学被摧毁之

后，华中重镇的武汉成了大学真空。1928年蔡元培在南京中央政府任大学院长，王世杰任法制局长，李四光任地质研究所所长，周鲠生在中央大学任教并在法制局兼职，他们和蔡元培商量，遂有在武昌筹设武汉大学之议。在武汉任国民党政治分会主席的李宗仁和在南京的蒋介石都要拉拢湖北人，为适应“鄂人治鄂”的要求，1928年5月，派张知本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并任湖北名人严立三、石瑛、张难先分任民政、建设、财政厅长，刘树杞为教育厅长。他们热心服务桑梓，都想给子孙后代办些好事实事。因而积极响应蔡元培先生创设武汉大学的倡议，并随即设立建校筹备委员会进行筹建工作。筹委为刘树杞、王星拱、周鲠生、曾昭安、黄建中。李宗仁派麦焕章为代表参加。同年8月，刘树杞受大学院之命兼代校长，在东厂口旧址主持登记旧生，招收新生和开学上课事宜。又聘李四光、王星拱、曾昭安、张难先、石瑛、叶雅各组成武大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以李四光为委员长。

李四光受任后，以其地质学家跋山涉水实地勘察的精神，亲自带着几个助手，踏遍了武汉市郊的山山水水，选定了邻近东湖偏僻荒凉而有广大发展前景的珞珈山和狮子山一带为武大新校址。此时，有一股目光短浅的旧势力，打起“节省人力物力”的幌子，主张按过去历次改建的惯例，换换新招牌。利用民国初年以来一直相沿的旧房，稍事扩充修补，作为新大学的校舍。李先生绝不以为然。他认为，武汉是历史重镇，首义名城，且地处九省通衢，是我国早期对外开放的国际商业都市，为中外观瞻所系。要在这里建立一所新大学，就必须从外观到内容，都是世界第一流的，才能与之相称。尽管外界的恶意中伤和流言蜚语，什么“好大喜功”，什么“不自量力”交驰而来，李先生“风雨不动安如山”，本着发展教育，造福后代的决心和信念，坚持建校工作，不稍松懈。他又亲自带着工程师缪思钊勘察珞珈山、狮子山每个山头，每条沟壑，还捡来各处的石头标本，对地形、地

质作了十分入微的了解，并测量校址地基，划定建校面积3,000亩。随即聘请加拿大开尔斯工程师为各项工程设计制图。建设新武大的蓝图制定后，南京政府大学院和湖北省政府根据规划，共同商定，拨建筑费银币150万元，中央地方各认一半。当即各拨20万元。正当按照设计图纸准备分期投标开工之日，李先生奉调返回他的地质工作岗位，旋即赴英讲学。刘树杞也辞去代校长兼职。不久随着湖北政府改组，这位不愿当官的学者，回到北京大学教书去了。

三 顶邪风、战恶浪，把建校坚持到底

1929年2月，王世杰先生受南京政府大学院长蔡元培先生之命，首任武汉大学正式校长，接替李、刘两先生建校、治校的双重任务。当时珞珈山新校舍的设计工作尚未最后完成，全校师生仍挤在东厂口旧校舍内上课。1931年1月，开尔斯工程师所绘制的珞珈山新校舍图案完成。在校长王先生的主持下，召集沪汉各大营造厂投标。初次得标的是汉口“汉协盛营造厂”。接着又有“袁瑞大”、“蔡广记”、“唐生记”等营造厂和“上海六合公司”。“唐生记”中标。当施工队伍开进工地平土打基之时，一股地方封建势力掀起迫使武大新校舍停工的邪风。这时以张知本、严立三、石瑛、张难先、刘树杞等认真办事的一班为主体的湖北省政府业已下台。代之而起的多是争权夺利的政客，那股想迫使武大新校舍停工的邪风，就是从那里冲出的。新的湖北省政府居然向学校发来紧急公文，以所谓“占用民地过多”为由，推翻上届政府的决议，指令正在开工的新校舍工程马上停工。这一急剧巨变，并没有使决心把武大建成为世界第一流大学的王先生惊惶失措。在就任之初，他就曾明白宣布：“关于创办武汉大学，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不办则已，要办就应当办成一所有崇高理想，具备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大学”。又说：“武汉在我国的地

位，相当于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都是处于全国交通、经济中心的大都市。我们应当在这里办起一所拥有文、法、理、工、医、农六个学院，规模宏大，十年后学生可达万人的大学”。

当时我们母校的学生人数只不过四五百人，他的“十年万人”设想，真是何等远大！

他又说：“从我国现有各大学情况看来，还没有任何一所，可以说是有了一个较系统的校舍设备的。南京的中央大学、广州的中山大学，都是当地以前的高等师范学校的旧址改建而成的；就是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也是由以前的京师大学堂和其它各种学校的旧校址改建而成的。但所谓京师大学堂以及其它各地的高等师范学校的原有校舍设备，实在都不过是中等学校的规模。一个办中学的校舍怎能办一个真正的大学呢？现在我们的旧校舍，也是由以前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一直沿用下来的，其原先规模，本就不及南京、广州的高师，目前更已残破不堪，太不象样，所以现在我们要想把武汉大学办为一所真正的大学，第一件刻不容缓和必须全力以赴的大事，就是要积极完成我们的新校舍建设。”本此信念，王先生顶着邪风前进，毅然亲赴省府，当面邀请他们这帮省府大员，亲临珞珈山现场视察，他们自恃有权，可以为所欲为，也就昂然而来。他首先引着他们，绕行山地一周。这帮老爷们一向养尊处优，从来就是两眼不往下看，两脚不踏实地，这时步履艰难地翻山越沟，早已被累得叫苦不迭，再加沿途所见，到处都乱石成堆，杂草丛生，简直找不到他们想象中的所谓“民地”，不免大失所望，更不禁做贼心虚，纷纷自请停步，中止视察。王先生依旧满面春风地殷勤待客，请他们到一间工地房子里休息，随即就地设宴款待。酒过三巡，王先生以主人身份，首先对他们不辞劳苦，亲临视察，表示欢迎和敬意，接着就引入正题说：“这座位于湖北省会近郊的荒山，在经历了几千年荒废之后，今天能被国家用来建设这所规模宏大的国立大学，